

丁一凡校友访谈（1973级）

受访者

1976年毕业后赴法国学习，获得波尔多第一大学法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。曾在美国约翰·霍布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做访问学者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，中国欧洲学会常务理事、法国分会会长，担任国家多个重要智库的专家。

采访者

陈雯静

您在初中时自学英语，后来进入北外学法语，之后又赴法学习，整个学习过程都是和外语紧密联系的，而且您能够熟练地使用英语、法语工作，请问您对外语、外语学习有什么样的感受和看法呢？

我们这一代是基本没有上中学的一代，我是1966年小学毕业，直到1968年的春天才重新入学，上了一年半初中，1969年就算是初中毕业了。当时时代比较特殊，上课的时候没有教材，老师只能拿一些人民日报的文章来讲语文，英语学了26个字母和一些口号，也没学到什么就下乡了。

下乡之后，知道毛泽东主席说过“大学还是要办的……”，就开始自学课程，包括英语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中国的外交事业特别繁忙：1971年，中国重返联合国；1972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。但懂外语的外交人才又奇缺。1973年北外开始招生，当时的背景下外语特别热门。经过工作单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师54团的推荐，我凭着自学的英语去参加考试，并且给老师留下了比较不错的印象，然后被接纳进北外法语系学习。

英语主要是工作以后学的。因为我在工作中发现它是一门国际交流语言，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交流都需要用到英语，所以又学了英语。英语比法语简单，很好学，它的百分之六七十个词汇都是从法语转化过去的，或者和法语一样，只是发音不同。所以对于会法语的人来说，学英语很容易。之后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，需要听课、听讲座、参加辩论、用英语做讲座，英语也就这样提高了。另外，在工作中也需要用英语写作，很多人要求我给他们用英语发文章，不停地写不停地说，英语就是在这样边干边学的过程中学会的。在学校学习外语和在社会中学习外语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

到现在来说，我们已经进入人工智能的时代，人工智能翻译已经非常好了，是不是学习外语就没有用了呢？其实不是的，学习外语还是非常重要的，外语不仅是个交流工具，外语是让你可以理解别人和别人文化背景的一种工具。总的来说，我们古代的军事思想家孙子说过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。跟外国人交流，你必须了解别人的文化背景，然后才能永远有把握。而在这个基础上，你要理解别人，光靠机器翻译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语言学习，是要学习语言背后的文化，通过学习语言去了解别人的文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不是那么简单，语言不

是机械的。

前两天我在网上读到一篇在四川大学教书的美国人写的文章，写的是这次疫情中，中国防疫抗疫的过程。其中讲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前一阵子美国爆发了黑人运动，一个中国学生的英文作文写了关于弗洛伊德（Floyd）之死这件事。大概是使用了翻译机器的缘故，这个学生将名字写为Freud，一位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，两个名字的中文写法相同，但外文拼写不同，让美国老师哭笑不得。这说明机器翻译还是不能完全代替人的，机器是比较机械的，学习外语你需要知道代号背后的含义。学习外语不能单单是为了学习外语，对名字的不理解，体现了对这位世界著名的奥地利心理学家不了解，也体现出我们的学生对外国文化背景的理解不到位。这也证明，在人工智能时代、在机器翻译已经非常发达的时代，学习外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学习的是外语背后的那一套知识、文化。

您在法语系读书的时候，法语系的整体氛围、课程设置、师资学生是什么样的呢？当时老师怎么训练学生语音的？

当年学习外语的条件当然不能和现在同日而语。那个时代学习外语当然是非常困难，因为无法获得什么法语资料，所以知识学习量是很小的，不像现在这样能接触到非常多的信息和知识。在整个学习过程中，我们只能拼命地在语言上下功夫，有一种要把丢掉的时间追回来的感觉，心底有这样的动力激励着自己。当时每天早上起来背课文，比较长的课文都是能一直念到滚瓜烂熟的。这样一来，对语法掌握得非常好。当时北外的老师都非常认真、负责，把我们语音矫正得很好。当时北外的特点之一就是口语特别好，表现在语音、语法、基础语言上。以至于学完四年法语后，我们刚到法国，法国人都很吃惊，说你们从来都没在法国待过，发音却可以和法国人一样纯正，也没有口音和错误，这就说明当时北外的基础学习和训练还是很扎实的。还有一点区别就是，那个时代的师生关系要比今天紧密得多，因为我们当时除了在学校学习，还需要去学工学农学军，这个过程中师生都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的，接触特别多。所以我们那一代学生毕业出去后都和老师保持着很好的关系，到现在还经常回来看望老师，感情还是比较深厚的。

当时法语系只有一个语音室，这已经很不错了。练习的时候，从字、词到句都要模仿，并且去寻找其中的规律。我们还有专门的语音矫正课，除了法国老

师，还有当时法语系语音最好的大罗（罗慎仪）、小罗（罗嘉美）两位老师，这些老师帮我们矫正各种各样的发音问题，所以我们的语音后来拿出去，是让法国人非常佩服的，到今天有时候跟法国人谈起来，他们都很佩服我们的法语教学怎么能把学生的语音教得那么标准、基本功那么好。

总体来说，在外语教学上，中国人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，而且是非常有效的，比起西方外语教学方法见效更快。中国人很快能够掌握外国语言的特点，有自己的一套外语教学的方法。

本科毕业和工作后，您曾经两次赴法求学最终获得政治学博士。其间您遇到了哪些困难？是怎么克服的？

现在的条件和那时完全不一样。当时我是通过全国选拔，考到了法国政府的奖学金，我们拿的是“文革”后法国政府恢复给中国政府的第一批奖学金。而且当时没有学历对等，需要重新在法国读本科，并不是像现在中国大学的毕业生到法国可以直接开始读研究生，于是我又参加了法国那边的考试，选择了法国的政治学院，获得了进入大学二年级学习的资格。当时是在波尔多上学，波尔多地区在文化上有它的特殊性，它跟巴黎的学术气氛不一样，巴黎的学术与德国联系得更紧，波尔多则跟英国交流得更多，波尔多学派有很深的英国烙印，波尔多的思想文化在法国是独成一派的，所以我在那里也受到了一定的熏陶。

在政治学院的学习过程中，最痛苦的就是要锻炼讲演能力。那时候，每一门大课讲完后，都有一个辅导课，助教会给学生出一些题目来现场演讲，中国学生会比较害羞，刚开始我会拿着讲稿上去念。但老师不允许，最多只能让学生写个提纲，然后上去自由发挥。讲演题目种类很多，五花八门，需要在短时间内尽量掌握很多信息，迅速提炼它们，按照一定的逻辑写成一个提纲，然后上去滔滔不绝。这种训练是非常痛苦的，许多课程都要这么准备，但这也非常锻炼人。我后来分析问题、讲演的能力都跟当时的训练有直接的关系。这套方法还是卓有成效的。

您在成为著名学者后，仍然在多所大学（北大、清华、北外等）教书，教学为您带来了什么呢？在和学生的接触中，您有什么体会和想法？

除了高校，我曾经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讲过两个学期。我觉得教学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随时和青年学生保持接触，保持密切的接触。一方面你可以知道青年人

的想法，了解他们的兴趣，可以发现社会的变化是怎么样的，社会思潮的变化如何体现在青年身上，这能够使人和社会主义思潮保持同步，教书跟与青年人接触就是强迫自己与时俱进的方法。你不得不跟他们一致，不得不了解他们，不得不回答他们的关切，这就使得我不得不去更新自己的知识。因为我涉猎的方面比较多，所以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用中文授课，我在北大教的是国际班，用英语给他们上课。现在的国际交流非常多，接触的面也非常广，知识面也非常广，你需要拿丰富的知识去与这些青年学生碰撞，这很有意思，我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是非常愉快的。

您在新华社和《光明日报》任职的过程中，采访了众多法国政治界、经济界、学术界人士，您觉得此类重大采访工作有哪些挑战？您是如何应对的？如果有同学有志从事新闻行业，您有何建议？

记者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在职位上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。特别是驻外记者，可以接触到当地非常重要的人，因为他们对于外国媒体是比较开放的。我在法国的時候，采访过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，特别是一些关键的人物。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《欧元时代》，这本书里面很多东西不光是书面材料，还有很多我采访的一手资料，有很多具体的故事是我采访当事人得到的。比如为这本书，我采访了法国前总理巴尔（Raymond Barre），他曾担任欧洲委员会副主席，是最早研究欧洲统一货币的人；还采访过雅克·阿塔利（Jacques Attali），他是法国前总统密特朗（François Mitterrand）的特别顾问，是当年欧洲统一货币的条约——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》的主要设计者。为这本书，我和他谈了一个半小时，所以我的书里有些东西是在其他书里找不到的，它们完全是一手访谈的资料。

在记者生涯中，我也有很多访谈技巧，都是跟一些法国记者学到的。曾经有个非常著名的法国记者，告诉我去采访一个大人物，最好什么东西都不带，比如录音设备、笔记本等等，那些东西会令他不敢与你畅所欲言。采访大人物的秘诀就是跟他们聊天，与他们深入地聊，推心置腹地聊，他们才会愿意毫无保留地把他们经历的那些细节告诉你。然后你要强迫自己用脑子记下来，回去以后马上写下来。当你集中精力与他谈话的时候，你是能够记得住的。我后来也在采访中用到这种方法，屡试不爽。这种谈话会给这些关键人物一种特别放心、作为朋友交流的感觉，他就很愿意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告诉你，甚至你可以触发他的一些灵

感，让他把一些火花说出来。所以我觉得我在采访法国重要人物的时候，往往能产生特别好的效果。比如我采访米歇尔·阿尔贝尔（Michel Albert），他是《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》（*Capitalisme contre capitalisme*）一书的作者，也是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院士。我和他谈了3个小时，他说他从来没有和记者谈过这么长时间。我不是像一般记者去问他几个问题，而是深入地去跟他探讨事情背后的文化、道理。如果你能够通过深入的对话与采访对象建立好的关系，你们甚至都可以成为朋友。比如我和米歇尔·阿尔贝尔后来也变成朋友，我去法国可以约他，我去巴黎也可以约见雅克·阿塔利。

通过采访是可以结交各种各样的朋友的。当年我们跟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·德斯坦（Giscard d'Estaing）也有差不多类似的关系。中欧、中法关系中有什么热点或者有什么难题的时候，我们去采访他，他一定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，一定愿意跟我们谈。这些东西取决于你在采访过程中如何和这些人物达成默契。其实人和人关系都是这样的，如果通过交谈能够让他的思想充分发挥，特别是能够触发他的灵感，使他对这些问题有深入阐述的话，他也会很高兴，他也会愿意继续接受你的采访，愿意跟你谈，这就是我当记者这些年来获得的感想。

建议：首先培养自己的交流能力，特别是语言能力，要让交流没有障碍。当他们觉得跟一个外国人交流没有语言障碍时，他们才会跟你谈得很深。我认为有很多他们跟我谈的问题是他们从来没跟法国记者谈过的，他们会把他们没跟法国记者说的告诉你，你可以知道更多的细节。要掌握好法语这个工具，学会交流技巧，使采访对象放心，让他愿意跟你交流。

您作为嘉宾经常在央视以中英法三语做节目，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，进行在线讲座（收看人数都是10万计），讨论的话题涉及经济、政治、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。请问您是如何完成自身知识的积累与扩充以及观点提炼的呢？

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信息时代，这个时代的学习是无止境的，终身学习是这个时代的特点。要保持好奇心。在学校学习的知识是有限的，在大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如何去学习。学习掌握信息的这种方法，是非常重要的。要学会如何从信息的海洋里找到有用的信息，把它们拼合成对你有用的论据。在处理紧急问题的时候有一个简单的方法，是笛卡尔提出的三段论，他对人的思维论述有这样一个方法：提出论据—反证—归纳，这种三段论至今仍然是一个特别有用的

分析方法。用这个简单的方法，基本能够自圆其说。有一次我跟着中联部到美国访问，和美国的一个社团交流，之后让我做一个讲演。我也没什么准备，讲了中美关系，就用了这个分析方法。讲完后那些美国听众非常兴奋。

您对法语学院的人才培养有什么建议呢？

如今在法语学院学习的学生真是赶上好时代了，你们赶上一个信息时代，而且你们学习法语有各方面的素材。我们当年除了课本很难有其他的東西，当然我们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一些课本之外的法语材料，但都非常困难，学习工具和材料都是非常有限的。对你们来说，互联网有数不尽的信息，你们的问题是，怎么样在信息的海洋里面学会游泳，而不被信息淹没，怎么才能在这个过程中去靠自己的学习掌握有用的信息，这是你们需要掌握的能力。还有一个就是你们赶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这个时代，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版图的影响是巨大的，所以别人也愿意倾听中国的声音。学好语言、掌握语言，用它来代表中国、发出中国的声音，现在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。我觉得你们赶上了好时代、好时机，又有这么好的条件，努力吧，青年人只要努力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。

寄语

努力学习，把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，你们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。